

# 当代文学的海外交流助推创作繁荣

□邓如冰



当代文学的海外交流是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人文交流主要有两个方面——内容的传播和人员的交流，对应到文学上，则是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和作家们的赴外交往。“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这两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目共睹的。

在文学创作和海外交流这一组关系上，一般认为自然是前者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先有创作繁荣才谈得上“走出去”，先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才能把“海外”的事情办好。然而，联系到作家们的创作实际以及文学传播的现状和趋势，则会发现，“海外”也会促进“国内”，当代文学的海外交流反过来也可以推动当代文学的创作繁荣。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当代文学也结束了多年的对外封闭，重新开启了海外交流的序章，一些沉寂已久的作家不仅得以重返文坛重新创作，也开始代表中国作家“重返世界”。在“新时期”初期，作家们的海外交流活动比人们想象中的更为活跃，仅1979年一年，就有钱锺书受美中学术委员会邀请、萧乾受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分别于4月和8月访问美国，恢复了中美隔绝30年后的正式文学交流；也是4月，巴金、徐迟、孔罗荪等一行赴法国里昂参加国际笔会大会；5月，周扬、欧阳山、杨沫等作家访问日本，续写了14年前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的历史；6月，艾青赴西德、奥地利和意大利；9月，曹禺等作家访瑞士……不少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迎来的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批（位）中国作家。中外作家得以面对面近距离交谈和相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又重新连接起来了。

作家们的海外交流在创作上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批新的作品。艾青的“归来的歌”中，有十余首是他根据自己于1979年访问欧洲的经历创作的诗歌。此行的许多作品如《访马克思故居》《古罗马的大竞技场》《慕尼黑》和《威尼斯小夜曲》等不仅对久违的西方的描绘，更是渗透着作者的人生体悟，是在“世界”视角中思考中国历史和人类命运的诗作。除诗歌外，散文创作显示了海外交流更丰富的成果。“新时期”初期赴外访问的作家写有大量游记散文，如萧乾《美国点滴》、丁玲《访美散记》、王蒙《浮光掠影记西德》、徐迟《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张洁《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等等，将丰富庞杂的域外风情展现在当时对外界尚较陌生的国人面前。有些内容如对超级市场、信用卡、高速公路、花园小径、冰淇淋等“稀奇”事物不厌其烦的描写，现在看来让人不禁莞尔，但谁能否认，当年这些琐碎的异国景观里便蕴藏着某种对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均至关重要的“现代性”因子呢？此后的当代异域游记散文长盛不衰，后来者生发出多个路径的创作，如余秋雨关于国外古迹的“文化散文”和陈丹燕的“女性旅行文学”等，或都可在这些“新时期”初期的游记散文上找到源头。

海外交流真正助力作家们在文学观念和写作技术上实现“突破”的是在小说领域。以大陆作家1979年就开始参与的知名国际文学交流项目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为例，由于主办方每年邀请作家在美国居住近四个月，中国作家得以在较长时期内近距离观察美国社会，并与其他多国作家密切交流，于是，

在“文化震惊”之中，创作的“新变”便于此萌芽。王蒙1980年曾参与此项目，他称这次美国之行是一次“惶惑”的旅程。在爱荷华，他完成了《杂色》的创作，他认为这篇小说“具有不同的意义”，“这意义就在于意义的茫然、困惑与接近丧失”。这与此前他擅长的“青春万岁”式的单纯色调完全不同，也与他初回文坛时“意识流”式的“现代”探索内核迥异。《杂色》是“新时期”初期较早出现的真正有“现代派”意味的小说，其诞生原因正是作家在异国所经历的文化冲击。1985年参与此项目的冯骥才在美期间对《三寸金莲》进行了修改，他本人认为，正是在“不同的文化视角”的“反观”之下，他对“三寸金莲”的本质“看得就更深刻与入木三分”，“批判也就更犀利”。对创作影响最明显的是1983年随母孀茹志鹃参加此项目的王安忆，她归国后创作的小鲍庄》《大刘庄》《乌托邦诗篇》等小说已完全不同于此前的“雯雯”系列，其原因便是美国之行使她“思想情感、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冲击和变化”。作为“寻根文学”代表作之一的《小鲍庄》的出现，是否说明了这样的事实：除了阿城等作家通过“阅读体验”而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外国文艺思潮的启发之外，王安忆的“异域体验”也是一个促使“寻根文学”发生的重要机缘。与上述作家不同的是，也有作家在海外交流中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式，如汪曾祺1987年在美国数次谈到中国文学的语言之美，赞美古人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表示自己追求的是“一枝动，百枝摇”的“活”的语言。2009年来到爱荷华的格非在演讲中对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曾沉迷的西方现代文学进行了反思，并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传统，对《红楼梦》《金瓶梅》等中国传统小说大加赞美。在此前后，他的小说《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已然表明，他已向曾经“叙事技术至上”的理念告别，而转向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寻求具有韵味的汉语叙事的可能。

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作家们的海外交流已成常态，交流方式也趋向多元化，除了传统的随作家代表团出访外，更多的是受邀参加巡回演讲、文学节、作家写作营、学术会议、驻校、书展等等，世界文学舞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作家的身影。“新时期”初期，大陆作家赴外更多的是希望了解和学习国外的经验，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外读者已经看到了中国文学的价值，感受到了中国作家的影响力。“中国声音”被越来越多的世界读者听见，这正是作家们海外交流的重要意义。

在很长时期内，英美等西方国家常用政治滤镜看待大陆当代文学，或期待在作品中看到神秘蛮愚的“东方景观”。然而，经过作家们多年的辛勤努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的价值越来越得到了认同，海外传播量和美誉度随之激增。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推出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的统计，近年来，海外图书馆收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类型图书。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新时期”以来在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如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王安忆、贾平凹、阿来、麦家、迟子建、刘慈欣等的主要作品在多个国家均有译介。事实表明，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宏伟事业中当仁不让的排头兵。

诚然，作家不会因为作品是否能海外传播而刻意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式，然而，在全球流通越来越便捷的时代，如何在“世界”语境中书写“中国经验”，却是一个作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新时期”初期的当代文学正是在寻求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获得“新生”的，朦胧诗、“现代派”小说、“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等具有变革意义的写作莫不受惠于海外文学资源。莫言作品在海外获得巨大声誉，是因为他在书写地道的“中国故事”的时候，其中蕴含的人类的痛苦与欢乐同时引发了海外读者的“共情”。一些更年轻的作家如刘慈欣、郝景芳等先后获得“雨果奖”等国际大奖，不仅展现了中国作家创作的全新面貌，同时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某些领域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刘慈欣的《三体》在海外销量和评价都极高，是中国文学作品成功进入海外寻常百姓家的典型案例。《三体》最大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更在于其传播了一个与过去海外读者心目中那个“古老中国”完全不同的“中国形象”——一个科技的、未来的、充满想象性和创造力的“现代中国”的形象。应该看到，这既是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着的科技进步给予作家的馈赠，同时也是人类在面对地球、星空和未来命运时的共同想象。刘慈欣、郝景芳在海外获奖极大地提升了科幻文学在国内的地位，激发了更多科幻作者的创作信心和热情，引发了中国的“科幻文学热”，很好地证明了文学作品的传播和创作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当代中国，优秀作品往往同时具备普遍的“世界性”和鲜活的“中国性”。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每天都在发生着新鲜的事情，她生气勃勃且蕴含着无限可能，对当代作家来说，这正是一个向世界读者讲述前所未有的“中国故事”的时代机遇。

在科技深刻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今天，海外交流促进文学创作的另一个例证是网络文学。若从2004年起点中文网开始向海外出售网络小说版权算起，中国的网络文学“出海”不到20年，却一路高歌猛进，使《盗墓笔记》《诛仙》等网络小说红遍东南亚等地。中国网络文学的“野蛮生长”刺激了海外市场的迅速发展，海外诞生了一批如wuxiaworld这样的专门翻译中国网络文学的网站，“起点国际”也把国内起点中文网的成功模式移植到了海外，把中国网络文学的受众群体迅速扩展到海外读者中。丰厚的利润刺激着国内更多的网文作者涌现，鼓励他们以高质量的创作捕获海外市场。值得一提的是，“起点国际”上还出现了数千名海外作者，“中国模式”的成功输出促发了海外网络文学的形成。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未来，中国网络文学是否会作为牵头者在世界范围内联动中外文学，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外作家和中外读者平等交流的“世界文学”网络，不妨给予期待。

在新时代，中国作家与“世界”对话的自信已大为增强，如何不负时代创作出更多好作品，在世界读者面前表现中国文学独特的魅力，把中国最优秀的文化、最美好的声音传递给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当代作家们仍需不懈努力。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如果我们以世界文学为坐标，中国作家作品在海外的影响力还有更多提升的空间。如今，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语言是英语，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实际情况是，相对于庞大的创作产量，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英语的，还是少了些。不能汉译英，也就难以让世界文坛关注，也难以让国外读者了解。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姜戎小说《狼图腾》问世后，知名的企鹅出版集团有非常敏锐的嗅觉，抢先一步，签订英文版权协议。其英译等版本自2007年陆续在全球推出。还有麦家的小说《解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英译本也是如此，发行量不俗。《解密》的英译本在英、美等21个英语国家同步上市，受到英美等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多家报刊刊登评论文章和访谈，对《解密》进行推介。有权威评论认为，麦家的小说艺术风格“混合了革命历史传奇和间谍小说，又有西方间谍小说和心理惊悚文学的影响”。而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发行仅一个多月，就打入“2014年度全美百佳图书榜”，随后获多个奖项，其中2015年还获得了声誉卓著的“雨果奖”。另外，近些年一些网络作品表现不错，偶有版权输出，成绩不小。不过，总体来看，仍不尽如人意。

我一直认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经过40多年的发展，应该说，其中的头部作品并不逊于国外叫得很响的作品。比如，陈忠实、史铁生，还有王蒙、莫言、贾平凹、余华、阿来、曹文轩、苏童、残雪、北岛等一批作家、诗人的作品。事实证明，中国作家完全可以写出，甚至还能写得更好。因此，从这个意义讲，中国作家不仅没有自卑的理由，而且有信心和底气走出去。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如何让中国文学找到更多的人类共通的情感，让中国故事“不隔”，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仍大有文章可做。总的说来，要想使中国的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很多因素需要考量。比如，首先是大量翻译问题，然后是交流传播包括推广渠道，在版权输出中进行世界通行的商业化运作等。关于翻译问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世界文坛上叫好的作品大都是国外汉学家翻译的。我们必须加强与国外汉学家的紧密联系和合作，与此同时，还应该多多培养自己的翻译家。我们的翻译家要有开阔的眼光，能够把中国当下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及时地翻译出去，让世界迅速了解中国文学的全貌，感知中国，并进一步让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发出光芒。

交流传播以及推广渠道同样不可或缺。切不可“酒香不怕巷子深”。有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不能有效精准地向世界传播、推广，作品翻译得再好也难以引起关注。另外，在版权输出中，我们应提倡世界通行的商业化运作方式。在商言商，不必低价出售甚至免费白送版权，应争取最大的商业利益和回报，使中国文学作品版权输出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形成良性循环。我认为上述环节，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脱节，而且只有环环相扣，才有可能让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真正大放异彩。

近年来，中国作协大力推动中国文学的对外交流，比如建立了“一带一路”文学联盟、区域性国际文学交流中心、中外文学论坛、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国际网络文学周等一系列机制和平台，举办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和翻译家工作坊等一系列深度交流活动，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打下了良好基础。

特别是，中国作协最近推出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支持作品的译介与传播，让人眼睛一亮。比如，借助中图公司多年建立的国际传播资源渠道，优选海外汉学家建立文学译者资源库，与海外优秀出版社合作推动中国文学作品海外落地；通过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展配套活动，扩大中国文学的海外推介；通过对外译介联动的新机制，不断助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据了解，目前已达成版权输出合作的，有《烟霞里》波斯文版、《凉山十八拍》英文版、《北流》越南文版、《月下》法文和印地文版等。中国作协的“扬帆”出海计划这一举措，着实让人点赞。

相信在中国作协的推动下，只要各方努力，中国文学“扬帆”出海，一定会结出更多丰硕的成果。（作者系《中国广播影视》杂志社总经理）

# 为中国文学「扬帆」出海点赞

□江耀进



# 国际视野下中国文学的新时代

□刘江凯

然不同于前期的文学作品。“新时代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它必须生成有自己时代特色和文学使命的作品。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最好的可能性，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之一。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容易关注那些改天换地的历史变革，却往往忽略静悄悄的积累。《万历十五年》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激烈的大历史和静悄悄的小历史之间复杂的关系。就“新时代文学”而言，它的出现更像是历史的厚积薄发，是一种宝贵的历史回像。首先，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这些互相关联的大历史事件让“新时代文学”有了充足的贮备、消化、生成的历史条件。其次，作为大历史融汇集结的“新时代文学”，它的发生时间并非一个断然开始的节点，而是符合历史内在逻辑的弹性时段。从现代性文化焦虑缓和的角度讲，窃以为新世纪前后我国对文化“软实力”“走出去”的重视，应该就是“新时代文学”兴起的前奏，而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视为中国与世界文学关系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标志事件。

相对于尖锐的大历史转折点，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和转折能够划出一条有规律的历史弧线，这是一个国家之幸、民族之福。近代以来，似乎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划出一条漂亮的、和平崛起的历史弧线。14世纪以来出现了四次大国崛起的浪潮，先后有9个大国竞相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成功

崛起又先后衰落，法、德、日、俄在大国崛起之路上起落反复。钱乘旦认为，美国作为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成功崛起的原因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以稳定政治局面保证国家的发展；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上形成强大的整体国家实力；坚持对外开放，善于汲取别国的经验和优点；富有创新意识，敢于创新；果断决策，抓住重大历史机遇。可以看出，美国崛起的核心保障其实也是主权、生产力、文化三大方面，并且同样遵循了前者为后者提供发展基础的规律。

中国正处于第五次大国崛起的浪潮当中。与21世纪以前大国崛起的殖民、侵略等历史背景不同的是，中国的崛起是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依靠自身积累和改革创新实现的，我想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之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中国却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当前世界充满了各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但中国有能力积极应对各类突发事件。这样的结果绝非朝夕之功，而是几代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出来的。

如果说世界充满了发展的不确定性，那么刚刚启航的新时代中国及其文学显然也具有鲜明的未完成性。“新时代文学”最基本的使命和特色就是要在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中，用文学想象的力量寻找到自己最好的可能性——这样的表述过于抽象，讲得具体一点，我自己对“新时代文学”大概有以下几点基本的理解和期待：其一，新时代文学是充分继承百年中国文

学发展史的新启航，需要依靠创作来确立自己的时代使命和艺术特色，因为“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写法”。文学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新的时代生活一定蕴藏着新的艺术可能，这就需要作家们有更高超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才能发掘出代表新时代精神的新形象，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

其二，新时代文学是对百年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文学新想象。文学作为全世界最为古老和普遍的艺术类型，始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保留了最为丰富和细腻的历史发展信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伟大的作品不仅能保留时代的万千气象，更是历史最好的记录员。不论是诗经的优雅、唐诗的气度，还是《红楼梦》的家族变迁、阿Q的“精神胜利法”，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既是后人研读历史的绝佳素材，也是体会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绝妙窗口。如果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很长时期充满了“感时忧国”的特征，那么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在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共振关系中，希望能成熟地呈现出一种平视世界的中国文学气派来。

其三，新时代文学是同时体现自身主体性和世界多样性的艺术创作。20世纪以来中国有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两次“西学东渐”的浪潮，体现在现当代文学中就是对

外国文学的学习与融合。新世纪前后，当代文学出现了更多回归传统文学的表现，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格非、苏童等作家，从语言、形式、结构、题材等多方面，尝试让古典与现代进行创新性融合。新时代文学作为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最新阶段，从传统资源、世界交流、当代生活几个方面都已经为创新积累了足够的贮备，应该不断涌现出一大批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优秀作品来。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会呈现出一种新的精神特征和时代品质。新时代文学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应该是沉稳和扎实的。从国际视野看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它首先面临的挑战是能否兼具民族特色和世界品质的艺术创作来确立自己的独特时代使命。其次，新时代文学在处理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关系时，是基于作品艺术审美能力和人类共同精神价值而“走出去”，只有这样的中国故事，才能真正实现对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效果。最后，充满自信的新时代中国文学，一定也是包容性和自由度很大的文学，它在表达主体性的同时，也会保护多样性。就像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闪亮的雪花》里那群在雪地上自由追逐的孩子们，甚至能将排练的失误转化为感人的一幕。这既是艺术审美，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教授）

## 新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

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台办

